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扬起龙头，带动实施“黄河战略”

□ 山东大学规划与战略研究中心课题组

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问题，发表重要讲话，并明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

作为沿黄九省区唯一地处东部、唯一沿黄又沿海的省份，山东在“黄河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龙头”作用，应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性机遇，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起到带头作用。

“南长江、北黄河”的协同推进，是我国通过构建“南北呼应、东西交融”的区域发展大格局，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均衡发展的重要探索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横贯东西三大区域的重要经济带，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黄河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继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后的第5个具有空间属性的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为形成我国“四大板块+五大战略”的多层次、全方位、高质量的区域协调发展大格局提供了战略支撑。

经过70多年的努力，我国成功构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的“四大板块”发展战略体系，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国土空间开发结构和经济社会分布格局，但也累积形成了两个急需解决的突出矛盾：一是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为代表的经济集聚区的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二是以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为代表的经济发展带的生产力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之间的矛盾。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大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协调解决发展规模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和“黄河战略”的主要目标，就是统筹流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解决生产力布局与生态安全格局之间的矛盾。

与长江经济带相比较，黄河流域的地理生态环境局限性更大，生态环境更脆弱，经济发展水平欠发达，急需统筹协调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将黄河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是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导下，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重大信号；“南长江、北黄河”的协同推进，也是我国通过构建“南北呼应、东西交融”的区域发展大格局，推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均衡发展的新探索。

实施“黄河战略”，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承担着防风固沙、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的重要职能。黄河流域生态脆弱，西北地区与东北部沙漠广布，中部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灾害频发，黄河大部分河道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区，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且存在“地上悬河”的安全威胁。实施“黄河战略”是新时代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实践，是关系中华民族长远利益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

实施“黄河战略”，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创新。黄河流域各省区经济总量占到我国经济总量的1/4，然而其中大部分来自中下游地区。黄河流域内部经济发展呈“阶梯状”分布，东西发展不平衡，区域协调发展的提升空间较大。黄河流域流经的9省区中，除四川省外全部位于北方地区，实施“黄河战略”有助于缓解南

北经济失衡现象，缩小流域内东西部差距，使区域经济发展趋于均衡。

实施“黄河战略”，是拓展经济增长空间的重要途径。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拥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支撑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及维护国防安全的战略资源。黄淮海平原、汾渭平原、河套灌区也是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和肉类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1/3左右。实施黄河战略有利于加快流域内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培育经济增长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挖掘广阔腹地蕴含的巨大内需潜力，促进经济增长空间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内陆和沿河内陆延伸，形成上中下游优势互补、协作互动的区域发展新格局。

作为沿黄九省区唯一地处东部、唯一沿黄又沿海的省份，山东有责任、有信心、也有能力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积极在“黄河战略”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滔滔黄河，润泽齐鲁。

黄河山东段位于黄河下游，自东明县流入，流经9个市26个县(市、区)，在东营市垦利区注入渤海，境内河道全长628公里。

“黄河战略”是继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中国(山东)自由贸易试验区、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之后，山东省承担的第四个国家级战略。这四大国家级战略交错互融、优势互补，为我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机遇。

实施“黄河战略”，是以“共抓生态大保护、推进环境大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的新纽带，建设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区。“黄河战略”是推动区域发展的综合性战略，为山东省承担的其他区域发展战略的同步实施，形成同频共振的叠加效应提供了大平台。

作为沿黄九省区唯一地处东部并拥有广大开放地带的省份，山东有信心、也有能力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积极在“黄河战略”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从区位看，山东省作为唯一沿黄又沿海的“河海交汇区”，区位优势明显，是实现“黄河战略”海陆统筹的战略支点。

从经济和人口看，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和常住人口占比分别为32.05%和23.9%，是沿黄各省区中经济最发达和常住人口最多的省份，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和人口大省。

从城镇化率看，山东城镇化率达到61.2%，居于沿黄九省区首位。

从产业看，山东省制造业实力雄厚，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产业辐射带动能力强。

实施“黄河战略”，山东应明晰发展定位、把握未来方向、深化制度创新，发挥好山东半岛城市群的龙头带动作用，拓展与沿黄各省区在生态保护、产业协作、经贸投资、商旅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引领黄河流域形成“东西互济、陆海联动”的开放协作新格局。

要成为“黄河战略”实施中的对外开放先行区。发挥东部沿海和河海交汇的地理区位优势，利用自贸区、上合示范区的开放载体和制度空间，打造国际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国家海洋经济对外合作中心和“黄河战略”便捷的出海通道，依托海上丝绸之路，强化青岛、烟台、威海、东营等海上合作战略支点作用，全面扩大境内外合作，统筹陆海协调发展，打造对外开放先行区。

要成为“黄河战略”实施中的科技创新引领区。山东要勇于担当“黄河战略”创新发展、先

试先行的先锋，以制度创新为基础，强化科技创新，激发创新活力。突出抓好齐鲁科创大走廊、中国量子谷、蓝色药库等创新平台载体建设，加快推进山东产业技术研究院、中科院海洋大科学研究中心、高等技术研究院、能源研究院等一批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强力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创建黄河流域科技创新引领区。

要成为“黄河战略”实施中的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黄河三角洲是重要的生态宝库和生物基因库，是我国“最具有开发潜力的三角洲”。应积极抓住这一区域优势资源，发挥后发优势，发展高效生态经济，加强与国家重要湿地、国家地质公园、黄河入海口为核心的生态圈建设与保护，打造黄河流域高效生态经济示范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为“黄河战略”高效生态经济发展探索新路径、积累新经验。

要成为“黄河战略”实施中的文化交融新高地。黄河文明催生的齐鲁文化，是沿黄走廊最具知名度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牌形象。要借助“黄河战略”的实施，积极促进黄河文化与儒家文化、泰山文化、运河文化、海洋文化的交融，充分发挥齐鲁文化综合优势，彰显齐鲁文化的品牌效应，描绘新时代、弘扬主旋律，讲好“黄河故事”，保护、传承、弘扬好黄河文化，打造黄河流域文化交融新高地。

树立超越地方和局部的“大系统”思维，主动对接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与黄河流域其他省区的合作，当前尤其要强化与河南省的联动，把国家战略真正落到实处

“黄河战略”为山东发展提供了重大历史性机遇。作为我国由南向北大开放、沿黄省区由东向西梯度发展的战略交汇点，山东有责任、也有能力发挥龙头作用，引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加快重大问题研究，编制好战略规划。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对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领导，抓紧开展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在推进“黄河战略”过程中，我们要从“国家高度、历史眼光、区域发展”的不同维度，明确战略定位，理清发展脉络，加快“沿河、跨河、携河、融河”的战略推进。组织编制好相关规划，加强规划协调衔接。树立由“取”到“安”的黄河治理新思维，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新理念，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水而定、量水而行的新方针，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制定差异化发展路线图。抓住“十四五”规划编制的良好机遇，在准确把握科技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结合沿黄生态要求，研究和规划未来产业重点发展领域，在黄河流域规划建设若干未来产业和生态产业示范区，推动沿黄地区产业链重组和整合，以未来产业的优先发展带动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增强与相关专项规划之间的协调衔接，健全规划体系，强化规划统领。要推动济南“携河”发展，拉开城市发展框架，更好发挥黄河中下游地区中心城市的作用。抓紧对我省沿黄城市的经济 and 产业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分析，引导各市明确本地发展优势，制定融入“黄河战略”、落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差异化发展举措，实现良性互动、错位竞争和协同发展。充分发挥黄河三角洲、黄河生态带等发展载体的作用，构建沿黄省市的合作平台，将国家重大战略落到实处。要处理好保护、治理、发展之间的关系，树立“经济是基础，文化是灵魂、生态是根本”的理念，把握中心城市与节点城市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布局，实现上下游、

干支流、左右岸统筹协调、共同发展。

切实做好黄河流域的大保护与大治理。“黄河战略”是立足于生态保护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战略，强调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山东省要着力打造完善的保护治理体系，从生态防护、防洪安全、用水约束、滩区迁建四个方面发力，全面提升新时代黄河流域的治理能力和水平，推动流域高质量发展。要全力实施黄河三角洲生态保护工程，打造黄河流域生态建设先行区；实施黄河沿岸湿地、植被、动物等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建设好河口湿地、济齐湿地等生态片区，整合沿黄湿地保护区，打造沿黄生态走廊，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积极推进东平湖、黄河故道等生态修复工程；积极开展黄海岸带修复，提升海洋资源环境的生态价值，促进黄河三角洲生态系统健康发展。防水患与治风沙并举，打造黄河流域长久安澜示范带。山东应全面做好凌情观测、查险抢险等工作；积极防汛管理体系建设，高标准抓好黄河防洪工程建设。“九曲黄河万里沙”，山东“悬河”问题尤为严重，应主动配合国家水沙调控体系和机制建设，对游荡性河段进行全面整治，尽早使全省黄河堤防和险工建设全部达到设计标准，病险涵闸全部得到有效处理。集约利用水资源，建设黄河流域现代化用水网络。山东水资源严重短缺，黄河作为主要客水资源，供水量达到了全省总供水量的30%以上，成为支撑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资源。山东省“依黄而兴”，更要珍惜节约黄河水，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节约集约转变。要坚持以水而定、量水而行，打通水系，完善水网，将水作为最大公约数，建设现代化水利基础设施和用水网络。

树立“大系统”思维，推进全域统筹发展。“黄河战略”作为一种跨区域的发展战略，需要一种超越地方和局部的“大系统”思维，立足山东、跳出山东，实施全流程统筹兼顾、协调治理。应主动对接国家相关部门，加强与黄河流域其他省区的合作，尤其要强化与河南省的联动，在黄河战略实施中做到“济郑引领、鲁豫先行”，产生联动效应，抢占先动优势，成为推进实施“黄河战略”的先行者和主力军。在战略实施中，要借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成功经验，敢于担当、先行先试、聚智聚力、引领示范、多方联动，建立多层次合作机制，创新协作机制，提高战略实施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探索建立跨区域合作机制。近年来，黄河流域9省区间的合作机制比较匮乏，与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相比较，更是黯然失色。应以融合共生发展为目标，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实现政策联动一体化，完善区域互动合作机制。积极推进建立黄河流域中下游协商合作机制，筹划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定期召开会议，协商解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搭建沿黄各省区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推动建立“黄河战略大数据库”；设立“黄河战略”跨区域合作高层次专家论坛，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磋商解决跨区域基础设施。应合理布局沿黄地区交通、能源、通信等重点基础设施，加强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特别是应加强鲁豫两省的互通互联，促进济南、郑州两大都市圈的融合发展。合力推进区域间产业协同。黄河流域上中下游的资源禀赋和环境承载力有较大差异，应根据地域特色和区域功能进行产业布局，避免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积极着手打造沿黄现代产业大走廊，加快新旧动能转换，调整重型产业结构，推动炼油、化工、有色金属等整合提升，通过优化重组、减量整合、上大压小、上新压旧，实现集聚力约高效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以山东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为引领，突出发展生态环保经济，着力增强产业生态构建能力。

(执笔：余东华 王梅娟)

收放自如，进退裕如

沈小平

管控不容易，放开更不容易。如何有效处理“收”与“放”的关系，在动态优化中寻找到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平衡点，考验的是对时与势的科学把握，是对规律与规矩的谨严遵从，是对事物“度”的精准拿捏。

习近平总书记在杭州考察时，针对现阶段疫情防控过程中的城市治理，特别强调：“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该放开来又能够有序地放开来，收放自如，进退裕如，这是一种能力。”这一重要论述，对我们当前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特别是兼顾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既要毫不放松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巩固和扩大战果，又要积极稳妥推动复工复产，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一种“两难”。难就难在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该收时能收得住、收得迅速，该放时能放得开、放得有序，“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从容娴熟切换施策重点。特别是当前境外输入病例仍有增加，又出现无症状感染者等新情况，如何有效地处理好“收”与“放”、“进”与“退”的关系，在动态优化中寻找找到复工复产和疫情防控之间的平衡点，这是一个新课题。正因如此，才更考验和检验我们的应对智慧和治理能力。

现代社会，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集聚，创造了城市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也蕴含着包括疾病传播在内的大量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能否准确把握时、度、效，妥善处理好社会治理方面的收与放、进与退的关系，既不操之过急、又不行动迟缓，有效应对和处置各种风险挑战，是对领导干部治理能力和工作本领的严峻考验。

“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经过一段时间艰苦努力，我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但境外疫情持续蔓延，输入风险居高不下，无症状感染者成为新的风险点。这种形势下，保持疫情防控成果、防止疫情反弹的任务，变得更加艰巨而繁重。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做到慎终如始。

要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抓紧抓实抓细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因时因势调整工作着力点 and 应对举措，“该管起来就能够迅速地管起来”，始终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有方。

要始终保持忧患意识、危机意识、风险意识和底线思维，对所做工作保持草摇叶响知鹿过、松风一起知虎来、一叶易色而知天下秋的敏锐直觉，平时补短板强弱项、不心存侥幸，“战时”自然能够部就部班、不手忙脚乱。唯有如此，该收时才能收得及时有力、管得恰到好处。

管控不容易，放开更不容易。疫情暴发并迅速蔓延，我们下决心从常态切换到非常态，这需要非凡的魄力和高超的胆识。现在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好转，我们要让生活生产生活重归常态，这更需要坚定的决断和担当。放，要有力有序、有方有效。既不能对不同地区采取“一刀切”的做法，阻碍经济社会秩序恢复，又不能不当放松防控，导致前功尽弃。这就需要把握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善于从危机困难中捕捉和创造机遇，“该放开能够有序地放开来”，徐徐放手，有序放开，分区分级实施差异化防控策略，把服务精准高效地落到疫情防控关键处、群众企业急需处，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不断释放发展的内生动力，力争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战时打胜仗，工夫在平常。打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两场战役，表面看是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条线，其实涉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收放自如、进退裕如的背后，是对时与势的科学把握，是对规律与规矩的谨严遵从，是对事物“度”的精准拿捏，是面对困难挑战时的从容练达。能够从容应对“黑天鹅”“灰犀牛”，首先要练好内功，而有效的社会治理无疑是关键一招。为此，党员干部一定要勇于经历“风吹浪打”，敢于接“烫手山芋”，多做“热锅上的蚂蚁”，涵养“风雨不动安如山”的定力，在这场大考中磨礱统揽全局之谋、责任担当之勇，既不陶醉于暂时的成功，也不在一时的失利中无法自拔，而是要把前行的节奏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高工作的预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如乘骏马，进退裕如”。管起来、放开的背后是精细管理、精准施策，体现的是对于社情民意的全面掌握、科学精准的分析预判、狠抓落实的决心魄力。在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考中，领导干部都要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不甩手、不失分寸，处理好中心工作、重点工作、一般工作之间的关系，着力解决好过河的“桥和船”的问题，切实提高工作执行力，切实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落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重关系

□ 行 久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要求我们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这三重关系，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风险挑战。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历史在全球化时代的必然选择。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将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当今世界并不安宁，各种全球性威胁和挑战层出不穷。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福利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巨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亟须从三个层面入手，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

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对自然的越来越巨大的干预能力，使人类在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同时，也因对自然的盲目掠夺性开发和非理性干涉，导致了大量严重的生态问题 and 环境问题。各种生态环境危机，包括自然灾害、重大疫情等，其影响范围远远超越国界，涉及全球和整个人类的利益，它像人类从潘多拉盒子中放出的恶魔，成为制约和威胁整个人类生存发展的全球问题。罗素曾说，科学要提高对自然的控制，从而提高人类的幸福和健康，一个假定条件即是理性的存在。而



对于自然的破坏性掠夺、技术至上主义等，使人类的很多实践行为，只具有进攻自然的工具意义，而缺乏价值理性的导引和规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要提升人类的理性水平，尊重自然、敬畏自然，遵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内在规律。

解决好人与社会的关系，构筑人与人、国与国讲信修睦、诚信为本、守望相助的和谐关系。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在现实中存在着极不和谐的紧张状况。经济发展的市场化，使个体独立意识增强，但也使利己主义、个人本位主义、集团本位主义泛滥。国家、民族、地区、阶层、集

团、个人之间充满对抗与冲突，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战争、核威胁、恐怖主义、民族地区争端等，严重损害了人类的和平与安宁，还有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不公正、南北差距、人口问题等，逆全球化、反全球化近年来甚嚣尘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可以说，人类社会生活中充满了不和谐的因素，处处有危机存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任重道远。社会危机同样具有全球性，它与每个国家、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密切相关，能否合理圆满地解决关系到人类文明的生死存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尊重各国自主权利，尊重文明多样性，走和平发展道路，促进各国共同繁荣。我们要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使合作共赢成为实现和平与发展目标的现实途径。每个国家甚至每个人，都要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发挥建设性作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解决好人与自身的关系，塑造担当作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主体。池田大作所言，现代社会给人们造成生存压力，在身心方面产生了症状，即所谓“现代病”的出现：精神恐惧，心理孤独，享主义、拜金主义盛行，价值失范，道德滑坡等。随着人与人时空距离的缩小，心理距离却在增大，人际关系冷漠化、疏离化、功利化倾向明显。人的自身发展违背了人性的要求，出现了大量的“单面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要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发展问题。这就要把人类能力的发展作为目的本身，使人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和“物的依赖性”，冲破自然必然性和历史必然性的枷锁，按照自己的个性特点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活动，从而使整个人类的自由发展同每个个人的自由发展达到完美的统一。这就需要每个个体自觉地进行各方面人格的塑造和自由个性的培养，自觉地提高各方面综合素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从上述三个层面入手，从根本上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克服现代文明面临的来自自然、社会和人自身三方面的危机和困境。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提升人的主体性水平，防范反主体性效应。反主体性效应是指在主体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过程中，对象化了的人的力量脱离主体的控制，违反人类主体的本性，甚至对人类自身的存在发展带来阻碍和危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身的关系问题的实质，就是人的反主体性效应的集中表现。反主体性效应，并不是一个在当代实践中才出现的问题，而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人类主体能力的强大和主体性效应的增强，使反主体性效应显得空前突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基于实践理性基础上的对于人类历史和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休戚与共、命运同天，人类只有正视自身问题，按照历史规律和客观规律正确解决各种现代性问题，才能真正达到自由境界。